

沙
知
编

向
觉
明
生
平
和
学
术

向
達
學
記



沙
知
編

向達學記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达学记/沙知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6

ISBN 978-7-108-03464-9

I. ①向… II. ①沙… III. ①向达 (1900~196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945 号

封扉题签: 集向达字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10.375

字 数 267 千字 图片 20 幅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目 次

向达的自传.....	1
向达先生小传 / 阎文儒、阎万钧	5
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向达 / 阴法鲁、萧良琮	17
向达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祭 / 陈玉龙	31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贺昌群	35
关于向达先生遗稿《自明初至解放前（Cir, 1405—1948） 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的说明 / 陈玉龙	40
伏案英伦 仆仆大漠 / 水天明	63
——谈向达教授对“敦煌学”的贡献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 张广达	71
二十六年间 / 谢方	82
——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	

惊沙撼大漠 / 荣新江	92
——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	
向达为书展《目录》指谬 / 李甦	119
《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 / 郑天挺	121
我与向达之友谊关系 / 谢国桢	123
忆与向觉明先生交往的琐事 / 张秀民	125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 / 金克木	129
——纪念向达先生	
与向达的交谊 / 杨宪益	134
回忆向达师 / 杨志玖	140
向达先生逝世十四年祭 / 萧离	147
可敬的人品 / 汪敬虞	153
缅怀向达先生 / 何兆武	156
忆向觉明师 / 邓锐龄	162
缅怀向达先生 / 蔡美彪	180
永远怀念向达先生 / 邹衡	186
回忆向达先生晚年的几件往事 / 夏应元	190
向达先生在历史所 / 萧良琼	196

回忆向觉明师 / 周清澍	206
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 / 谢方	217
有关向觉明（达）师二三事 / 何龄修	222
向达先生指导我写论文 / 陈智超	229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 / 郝斌	234
——记“牛棚”里的向达	
谆谆教诲益终生 / 李斌城	246
——忆向达先生教导我写毕业论文	
回忆向觉明先生 / 李锡厚	249
记与向达先生的一段接触 / 诸天寅	255
爱国者、学者、长者 / 向燕生	262
——回忆我的父亲向达教授	
向达先生与我的父亲 / 贺龄华	268
陈寅恪与向达在康乐园的会晤 / 陆键东	275
忆向达师与郑天挺先生 / 郑克晟	286
向达、潘光旦和土家族调查 / 潘乃穆	293
忆邵向两家的情谊 / 邵瑜	306

附录一 向达著译目录/阎万钧编	310
附录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向达先生 手抄文献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320
编后记 / 沙知	323

向达的自传

我是湖南湘西溆浦县人，公元一九〇〇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一九一一年进小学的时候，家里因为父亲已于一九〇九年去世，情况不如从前。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接着升学，有点担负不了，所以在家里休息一年，自己补习。一九一九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样可以不要家里花钱；一九二三年高师毕业，一九二四年在东南大学毕业。在师范学的是文史地，在大学学的是历史。

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相当困难，后来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译员。从一九二四年夏入商务，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一九三〇年秋因人介绍，转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图书馆）的编辑之职。一九三五年由图书馆派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交换馆员，替牛津整理中文图书。一九三六年秋牛津工作完毕，遂至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院內研究敦煌出土的卷子和太平天国文书，这算是北平图书馆交给我的研究工作。生活费用是由在牛津工作所得的工资以及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请得的奖学金来维持的。一九三七年冬由伦敦转赴法国巴黎，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继续研究巴黎所藏敦煌出土的卷子，以及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一些文献。到巴黎以后，还没有开始

工作之前，曾顺便到德国游历，在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看了所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古文书，此外也到德累士登、慕尼黑等地去玩过，主要的是看画苑和博物馆。

一九三八年八月从法国回国，取道香港、越南，经昆明、贵阳，回到溆浦老家，因为我的妻子已于“七七”以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家了。

回国以后，因北平图书馆已迁至昆明，缩小范围，遂辞去职务，在老家住了半年。一九三九年三月，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找我去教书，遂携带妻和两个孩子到了浙大。在浙大史地系教了半年书，又转就北京大学之聘，于一九三九年秋到了昆明，作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专任导师，并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一九四一年，那时候的中央研究院组织了西北史地考查团，在额济纳河和敦煌一带进行考古工作，要我参加。我因把家搬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自己从重庆经兰州到敦煌。一九四二年夏回到李庄，一九四三年春又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从四川出发，再到敦煌进行发掘工作，当年冬我一个人先回四川。一九四五年回到西南联大，一九四六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我随北大回到北京。从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在北京大学工作。

我以前只在北大历史系担任教授，教书以外，不兼其他职务。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被围，胡适逃跑，当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子水也跟着胡适逃跑了。那时候的北大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三人组织维持小组，汤用彤先生（当时的文学学院院长）要我暂时照管图书馆方面的事情。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北大由军管会接管，仍然要我管理图书馆。到现在我还是以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一九五四年五月起，中国科学院征得北大的同意，命我兼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的职务。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是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第二副所长是西北大学侯外庐校长。

解放以前，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活动和社会工作。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我被提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五年被提名为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同年六月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

我于一九二四年在大学毕业，至今整整三十一年。最初的十五年，作的是编译编辑和研究工作，以后的十六年始终在大学里担任教学和行政方面的工作。这三十几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是动荡极其急剧的时代：一九一（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上海的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我都经历过。有好些思想进步的朋友们，在激烈的革命战争中都牺牲了。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因为出身于所谓“读书人家”，受的又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错误思想。那时候国家形势有激烈的变化，而我仍然埋首伏案，搞自己的学问。七七抗日战争起来，我正在英国，加入了中国留英学生抗日救国会，帮着办报，做宣传工作，不过至此而止，还不能放弃自己的学问工作，所以迟至一九三八年才回国。一九三九年到浙大，以后到西南联大。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省，跑了不少地方，也看到了不少东西，很激起我的一些愤慨。一九四五年回到昆明西南联大，那时候昆明学生运动正在高涨，我虽然没有加入当时的民主党派，而我的言论和行动，却是站在进步的一边。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我的行为仍然是倾向于进步的一面。我虽然有正义感，但我并不加入民主党派，这充分表现了我的旧知识分子的性格。

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专门研究中西交通史。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开过中西交通史、印度史、中国考古学史、亚洲史和中国史料学等课程。在所开的这些课程里，我没有替蒋介石反动派作过宣传，但是我用的是纯客观主义的看法。不问政治的纯学术的观点支配了我的思想，也感染了一部分学生，所以一九五二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

候，一些听过我的课的老学生就曾这样批评过我。在解放前的几年，当时的斗争极其激烈，一些有为的青年，有的毅然参加革命的队伍，有的彷徨歧路，很想得到先生们的启发。我在当时北大的教师中，是比较被学生尊重的一个，而我没有挺身而出指示他们正确的道路，只教他们搞学问，树立了一个错误的榜样，影响了一部分学生。我这样作，无意中帮了胡适和反动派的忙。一九五二年老学生对我提意见，很刺痛了我，因而使我认识到过去的错误。

一九四九年北京以及全国解放，我参加了所有的学习。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个多月的慰问，使我深深认识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朝鲜归来，派我到陕西、甘肃和新疆去做传达工作。我作传达的地方主要是新疆的南疆一带，到过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以及偏僻的尉犁、麦盖提等县。这一次的传达使我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有更深的体会。因为我这一姓，在湘西原来就是少数民族，六七百年来数典忘祖，解放以后始重新提起。新疆之行，对于我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我在解放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所工作的地方都是一些文教机关，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与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全无渊源。与北大的胡适、北京图书馆的袁同礼，只是一般的校长与教员、馆长与馆员的关系。我到商务印书馆是考进去的，在这里我认识了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郑振铎诸位先生，因为他们都是当时商务的编辑。

（编按：《自传》约写于1955年至1956年之间。

孟彦弘据邓锐龄藏手稿摘录，参阅书后“自传手迹”图版。）

向达先生小传

阎文儒 阎万钧

向达先生，字觉明，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一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及敦煌学等研究工作。先生 1900 年生于湖南省溆浦县，1966 年逝世于北京，享年 66 岁。

先生出身于土家族一个清代小官吏家庭。幼年时期跟随父亲在广东梅县县知事任上。几年后，先生父亲病故于梅县任所。因为官清廉家无余储，母亲只能在亲友资助下，带着先生及其他儿女们返回湖南溆浦家乡。

先生从小喜欢读书。母亲刘氏（编按：应作舒和玉）虽不识字，但在父亲影响下，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回到湖南故里后，先生便在家乡小学校中读书。小学课程，先生是以全优成绩而结束的。自从父亲去世后，家境渐趋贫寒。到先生读中学时，母亲只能省吃俭用节余钱来供先生读书。在长沙，先生考上了明德中学。中学时期先生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秀。但是他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之生活作风，从不乱花一文铜板。零用钱全部用来买书，衣服完全是母亲用土布缝制的。

先生中学毕业后，受到当时“实业救国”思想之影响，立志考南洋或北洋大学，然后去美国攻读化学。但因家境衰落，无力供给

先生学费，只好改考东南高师，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入数理化部，专攻化学。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先生积极参加学生会组织学生运动，热情地宣传新文化，投身到欢迎“德”“赛”二先生（民主与自由）的群众运动中。一年后先生改变了“实业救国”之主张，放弃学化学改学文史，转入高师文史部。从此先生走入史学研究之道路。在大学生活中，先生仍以顽强刻苦之精神进行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知识。先生勤奋好学，受到柳诒徵教授与陈鹤琴先生的赏识。

大学毕业对于一个穷苦学生来说凝聚着多少艰辛痛苦，也带来了多少欢乐与希望。毕业的欢乐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就业的苦恼。

暑期中先生投考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了临时编辑。由于他在文史与英文学识上有超人之处，假期后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聘书，任英文见习编辑。

当时商务印书馆负责人是王云五先生。编辑主任是何炳松先生。他们计划编辑一部百科全书，要求每人每天最少翻译一千五百字，当天译不够第二天补齐。长期不够要扣工资，而且有被开除的危险，超额者可以得到少量奖金。先生为了生活就得拼命地工作与学习，白天在馆里不抬头地翻读资料，晚上背英文字典。工夫不负苦心人，先生刻苦努力工作，以致取得一定之效果。除翻译大量资料外，还和梁思成先生（等）一起翻译了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自己单独翻译了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这是先生接触中西交通史之开始，并对此产生了极浓厚之兴趣，渐渐走上了研究中西交通史之道路。这段时期里先生又翻译了《印度现代史》。从1926年到1929年（进北图前）先生共发表论文及翻译文章多达19篇。对于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之青年学者来讲，是十分不易的。没有艰苦顽强之精神绝办不到。

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十分关心政局之发展及工人运动斗争形势。当时商务印书馆之工会是陈云同志参与领导。排字工人在党与

工会的领导下起来与资方斗争。对此，先生十分同情，并经常给予道义上和经济上之支持。

在商务印书馆任一名普通编辑，工资极为微薄。但先生还是十分关心自己妹妹的学习和生活，把她接到上海来读书。在他的帮助下首先进入立达学园补习功课，然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0年北平图书馆建立新馆。先生经已故北平图书馆研究员赵万里先生介绍，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先生自从进入北平图书馆工作后，身处知识的海洋之中，便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与工作，经常伏案工作至午夜后一两点钟。每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假日，他早已忘却了。先生除自己发奋读书之外还经常向一些知名学者学习、请教，如冯承钧、陈垣二先生。同时先生也与馆中的年轻学者，如赵万里、王以中、王重民、孙楷第、贺昌群诸先生一起商讨、研究学术。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先生之学识，得到突飞猛进。如果说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五年里，树立了一个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之工作作风，而在北图时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闻名中外的学者，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先生这时专心致力于中西交通史之研究，早在1925年他就去南京调查摄山之佛教艺术。文献误认摄山舍利塔是隋代建筑，但先生从石窟佛座前残余的衣纹和窟外力士像推论，准确地论述了摄山佛教舍利塔为南朝的作品。（编按：述评可疑，请参向先生原作。）从1926年先生开始对印度佛教及佛教艺术之东传进行研究。先生年仅26岁时就写出了《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论述了龟兹人苏祇婆入中原，善琵琶，而其七调中之“般赡”、“娑陀力”二调，即印度北宗古乐之钩沉，其余“鸡认”等五调则无征矣。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竟能有此近二万字之专著，为凌廷堪再作补正，国人中诚属罕见。

先生于1929年写出《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论述费信的《星槎胜览》以及《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著作。先生又在《论唐代佛曲》一文中提出中原乐曲，一部分是受到西域龟兹乐之影响，而龟兹乐又受到印度北宗古乐之影响。于是他又提出“佛曲”发源于印度北宗说：一、龟兹与印度北部种族上相同；二、印度文化与龟兹古史之关系；三、龟兹乐与天竺乐之关系。在音乐史上又论述到：一、娑陁力调即北宗之 Shadjah 调；二、般赡调即北宗之 Pañchamah 调；三、旦（即均，后来的宫调）即北宗之 thāt。因为佛曲渊源于印度北宗，如《佛本行赞》为洋洋数万言的叙事诗，孝子董永、季布歌等变文是从《佛所行赞》那种佛教文学蜕变而出的。至于俗文学变文之类，大约是模仿佛教之体裁。如“散文”是佛经中之“长行”，“韵语”是佛经中之“偈”。因而先生说唐代“俗文学”的发生，是渊源于“佛曲”的。

30年代先生又有几篇文章论述汉、唐、明、清中国内地文化艺术等方面受西方之影响。1933年先生在《燕京学报》专号上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是他一生中的代表作。文章论述于阗、龟兹和昭武九姓各国居住中国的西域人，阐明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阿罗本当是罗马东徼（Roman Orient）之人。其他僧人也是中亚人。又指出到长安西市之胡店与胡姬，及开元前后之胡化，时世妆“圆鬟椎髻”、“乌膏注唇”，食品中之烧饼、饅饅、依高昌法制出之葡萄酒、依波斯法制出之三勒浆等等。文章还论述了由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如柘枝舞与胡腾、胡旋舞。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还介绍了胡人入中原后康居人改姓康氏，安国人改姓安氏，月支人改为支氏，曹国人改姓曹氏，龟兹人改姓白氏，焉耆人改姓龙氏，疏勒人改姓裴氏，于阗人改姓尉迟氏，并列举各姓氏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其后还有《柘枝舞小考》与《螭屋大秦寺略记》。先生证实唐代之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唐人之文化生活与西域民族间亲密交往关系，至今仍是很有

价值的一篇论文，而此文即成为先生文集的名称。因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尤其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上，显有成就，所以193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聘请先生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

先生生前曾多次谈到他为什么要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并取得成绩的原因。自从30年代，他开始翻译英国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时，对他们盗劫我国文物之行为极为愤怒，更不能容忍的是斯坦因、伯希和与柯兹洛夫等文物大盗们对我国文物遗产、艺术瑰宝——敦煌藏经洞文物之劫夺。软弱无能之旧中国反动政府对此束手无策，那些披着学者外衣的强盗们在学术上对中国专家们百般污辱，这一切行为都激励着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学者要与外国强盗们争一高低。先生下决心发愤图强，使我国西域文明与敦煌文化艺术放出更加灿烂光辉。

由于先生的不懈努力，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上颇有成绩，深得当时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之赏识。当1934年北平图书馆与英国博物馆达成互换馆员，（编按：《自传》谓到牛津大学图书馆作交换馆员。）进行学术交流的协议时，袁同礼便派先生与王重民先生到英、法、德等国去进行学术考察。1935年先生首先到达伦敦，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专心致力于敦煌卷子之研究工作，当时英国人还没有把他们从中国盗来的大量敦煌卷子整理编目，先生就采取抄录的办法，把敦煌卷子和其他一些重要文献进行抄录，从1936年到1937年一年之中他看了五百左右的卷子，重要卷子俱加以拍照。然后他又去法国巴黎看了伯希和盗去之卷子，对散流在国外之我国重要珍贵史料进行了抄录。由于先生有了这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于1937年至1939年写出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其中俗文学作品收录近四十几篇。除有世人皆知之《目连变》、《降魔变》、《舜子变》、《昭君变》等文外，又有《汉将王陵变》、《维摩诘经唱文》、《季布骂阵词文》、《秋胡小说》、《伍子胥小说》、《韩朋赋》、《燕子赋》、《太公家教》等通俗书，为

俗文学史的研究搜集了丰富的资料。1936 年先生写出了《记牛津（英国）所藏的中文书》，记出牛津所藏之中文书 1604 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到 1628 年（明崇祯元年）是入藏的确实年代，其中有《永乐大典》十二册，以及明版书二百余部。短短几年时间，先生以一个热爱祖国文物之学者，以严肃认真之态度，顽强卓绝之精神，做出大量之工作与研究。他的工作态度与顽强之精神使英、法同事们大为惊奇。但他们又怎能理解一个爱国有志学者之情感呢？先生在赴欧期间还到过德国。看了德国人从新疆窃去的石窟壁画和唐人写本，并做了详尽记录。把劫去之《太平天国文书》从头到尾翻阅，并抄录几大本带回国来。

在这次考察期间，先生在国外并非只是沉醉在学术研究里。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危机之中。抗日救亡运动在国内外蓬勃发展。爱国留学生纷纷投入救亡运动。先生在巴黎（编按：应是伦敦）参加了留学生会工作，和吕叔湘、王礼锡诸先生一起编写了留学生抗日小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危机，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先生心急如焚，拟早日回国参加抗日工作。在巴黎他见到了当时在巴黎之吴玉章同志。把自己急于回国参加抗日的心情讲与吴老，吴老力劝先生安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告诉他说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这项工作是祖国需要的，要珍视这个机会，多做些工作，然后再回去，对祖国是大有用处的。在吴老的劝说下，先生才安心下来，一方面积极参加留学生救亡工作，另一方面更加勤奋地工作。争取多为祖国做出贡献。

1938 年秋，先生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宝贵资料，从欧洲返回烽火中危机重重之祖国。先生回国后先到湖南。以后一方面应浙江大学史地系之聘到广西宜山任史地系教授，另一方面开始整理从国外抄录来的大量资料。1939 年到 1940 年 6 月，先生先后在《图书季刊》上发表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瀛涯琐志——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回国半年之后，北大文科研究所聘先生为